

说到长城，我们自然会想到连绵起伏的墙体、雄伟壮丽的关隘；想到驻守的将士、征战的健儿；想到“万里长城永不倒”“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可以说，长城集实体形象、人文情怀、精神内涵于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长城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开垦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中原政权向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推进农耕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游牧民族则时常以马上骑射的方式对农耕地区进行侵扰。为阻止游牧骑兵南下，各个时期的中原政权大多不约而同在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目的是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适度隔离，维护相互间的生产秩序，降低战争风险。所谓：“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但在客观上，长城却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交往距离进一步拉近，经济、文化上的互补性日益增强，彼此间的交流往来更加密切，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长城强化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经济互动和依存

自战国秦汉以后，各个政权修筑的长城主要位于农牧交错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产品的单一性和不易保存性使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农耕地区的粮食、手工业品及酒曲、茶叶等产品。同样，从游牧民族那里得到牛、马等大型牲畜和产品，也有利于中原政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军事实力。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这种强烈的相互依存性与互补性，使长城内外各民族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并呈现出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在长城修筑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往往呈无序的自然交流状态，由于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交易常常难以完成。游牧骑手携带畜产品来到农耕地区，随时有可能将贸易转换成掠夺。长城修筑后，这



王绍东

长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影响

种贸易在西汉初期转换成关市的形式。汉朝与匈奴订和亲之约，就包括了开放关市的规定。《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有序的关市贸易，不仅使姑臧成为“富邑”，而且使这里的居民有了更多发家致富的机会，为长城地带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交融的局面，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的互市贸易更加频繁。柔然与北魏之间通过朝贡的方式交易物资，北朝用马匹换取南朝的香料，北魏在洛阳设置“四夷馆”安置周边各族及中亚、拜占庭来华的商人。隋唐时期，长城地带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宏大，满足了双方的互补性需求，“彼此丰足，皆有便宜”。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建立地方和大一统政权，方便并活跃了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过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交流物资，在长城的关口之处多设置马市，许多马市如大同、张家口等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城市。到了清朝，旅蒙商人活跃于长城南北，全国商贸网络基本形成。

从历史上看，长城的修筑非但没有隔断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反而强化了两种经济形态的

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经济互动必然会带来文化交融和情感沟通，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长城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生产的持续进行需要稳定的、有秩序的社会条件。为了更好地抵御游牧民族的冲击，中原农耕民族需要加强整体力量，建立大一统的王朝。自战国时期开始，秦赵燕政权不约而同地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就是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将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长城以北，更好地保护农耕文明。而长城的修筑，增强了农耕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推动了长城以南地区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与巩固。

长城的修筑在促进中原地区团结与统一的同时，也促进了长城以北地区游牧民族的交融与统一。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存在着众多的混合经济部落，这些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为了防止对草场的争夺造成部落间的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权来划分草场资源和确定不同部落的迁徙转移路线。同时，长城的修筑阻隔了游牧民族南下的通道，游牧民族为了突破长城的防线，也需要凝聚成集体的力量，统一广大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

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长城南北的各自统一，又为全国范围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费孝通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终将成为混同南北的一个大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

而与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相伴的长城道路交通网建设，则进一步强化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认同。长城道路交通网包括平行道、丁字道和十字道三种形式，分别起到了将长城沿线连为一体、从内地为长城提供物资军需援助、为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建立通道的作用。长城道路交通网建设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发挥长城军事防御作用，但在客观上看，首先加强了中原各个地区的联系与往来，将中原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为一个整体。其次，也加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联系、交流与往来，这种作用在历史上一直得到了发挥。从某种程度上说，道路是“更加坚固的长城，它的手段不是阻遏，而是融通和化解，因而它建立的秩序更加稳固和长久”。长城的修筑，促进了长城南北的道路交通网建设；道路交通网的建设，则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经济的交流与贸易的往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交融，强化了“长城内外是一家”的民族认同。

长城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亲近

历史上，尽管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有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但更多的时间是和平相处、文化交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碰撞交融、频繁互动、相互学习，由多元走向一体。

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进入长城以南，虽然主要是由经济与环境因素导致的，但也有其对中原文化钦慕的原因。仰慕中原文化、主动学习中原文化，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共同追求。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跨越长城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不约而同地学习中原文化，将儒家文化视为正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强大游牧政权的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就经历了对抗、和亲、内附、融合于华夏的过程。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借鉴从来不是单向的。历史上也有不少农耕民族学习借鉴游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例子。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等等。

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不乏长城内外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记载。匈奴是夏人的后裔，鲜卑是黄帝的子孙。南北朝之后，黄帝几乎被塑造成北方各族的共同祖先。各个民族通过祖先认同，意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强化

彼此间的认同。隋唐的帝王流淌着鲜卑族的血脉，他们的观念更加开放、更强调民族平等性。唐太宗曾对臣下表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清朝的建立，将中国的统一推进到新高度。康熙强调长城内外各族是一家，“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一以公正处之”。他认为应该废止长城的修筑，民众一心与民族和睦是更坚固的长城。

近代以来，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削弱，其精神价值则进一步凸显。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军队在长城沿线展开了顽强抵抗，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搏斗。1933年4月在《时事月报》刊登的一幅名为《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的插画，描绘一个巨人般的战士紧握步枪，跨过低矮的城墙，冲向前方。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特质融入其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长城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更加深入人心。

长城蕴含了追求和平、维护秩序、凝聚民心、和谐共处的多重寓意。放眼历史长河，长城地带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制度与文化间的碰撞交融、频繁互动，由冲突渐趋融合，呈现出一幅壮美生动的、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融合画卷。长城内外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注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生动写照。



霍州窑：发展史的缺环填补中国陶瓷

刘 岩

书的《格古要论》，书中从古玩鉴赏的角度对霍州窑元代生产的细白瓷产品和定窑的关系做了简要评价。虽只言片语，却将霍州窑与汝窑、龙泉窑、古定窑等名窑并列记载，显示出霍州窑的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北宋后期霍州窑开始烧造，面貌与汾河流域北宋汴窑基本相同。金代霍州窑烧瓷技术迅速成熟，呈现特征迥异的地域性窑业面貌。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兼烧粗白瓷和黑釉瓷。以“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细白胎施透明釉，擦去釉层露出环形胎体，同类器物直接相叠接触，最大限度利用了窑内空间，是保证产量前提下的高档产品生产策略。以细凸线纹印花为显著装饰特征，纹样题材极富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纹样连续布局或等分栏布置。印花纹饰中的姓氏标记，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产经济形态和强烈的商品生产意识。霍州窑金代细凸线纹印花装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其活泼灵动的艺术风格整体表现出与定窑印花规整、繁密风格迥异的面貌，两者共存、相得益彰。

元代手工业极度发达，文化元素多元，作为元代全国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霍州窑表现出很强的包容性、认同性和创造性，产品器形和审美引领了社会风尚。印花效果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纹样立体而有层次感。这里生产全国最高质量的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做法讲究，追求素白、光洁的视觉效果。

与之适应的是霍州窑独有的核心支烧技术——“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技术”，这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的延续与创新。这一支烧技术，是综合平衡粘钉自身特性、器物坯体承重、产品洁白外观、产品产量保障、燃料经济性等方面的产物，是霍州窑工的智慧结晶，对古代陶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元代霍州窑产品流布范围广泛，在陆路、水路交通线上皆可见到它的身影，在内蒙古集宁路、燕家梁遗址有出土，在元大都、元中都、和林古城等地均有发现，表明霍州窑产品不仅供应民间，还销往高端市场，应已进入宫廷消费。元代是霍州窑的高光时刻，在北方地区白瓷窑场生产

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成为北方地区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也成就了北方地区继邢窑（巩义窑）、定窑之后细白瓷生产的最后高峰，成为元代制瓷手工业的标志性代表。

时至明代，霍州窑生产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北方地区瓷器产品的重要供应地。大量的日用瓷以化妆白瓷为主，流行白地褐花装饰。纹样题材多样，绘画手法分精粗两类。艺术风格工笔与写意兼具，写实与意趣共存，总体呈现粗料细作的巧思。除日用瓷外，这里生产祭、礼器，是明代祭器的“瓷器化”和“日用器化”的实物印证，深度参与社会精神文化的塑造与传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霍州窑还因其深厚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在明代初年受到官方关注，为明代藩王府烧制高档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产品。明代霍州窑的烧造方法继承了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传统，唯形态、成分有差，呈现出稳定的支烧技术传统和清晰的演变规律。

霍州窑址发掘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填补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缺环。以印花白瓷、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技术、瓷质祭器、藩王府用瓷为代表的新的发现，让人耳目一新，向世人呈现出一个全新的霍州窑面貌。明代窑业遗存的开创性工作，对于北方明代陶瓷编年的建立和探讨南北方瓷业格局研究等都具有基础意义。霍州窑印证了中国细白瓷生产中心的转移，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和辉煌。

与此同时，霍州窑窑业演变轨迹也是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位于河北、河南、陕西之间的山西，凭借其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霍州窑在金元明时期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印证了山西是北方地区经济中心、手工业生产核心区，也为瓷业交流、瓷业格局、人地关系、地方社会等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体现和生动诠释。



从考古看文明

（上接1版）文艺是“特殊的精神生产”，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产生不可估量的正向作用。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自觉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文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以来，全国文艺界和文联系统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主题，围绕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乡村振兴、援疆援藏等重大战略，开展了主题展览、形式多样的文艺实践活动，发挥了文艺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要求文联组织胸怀“国之大者”、肩负“责之重者”，聚焦大事、顺应大势、服务大局，汇聚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智慧、才情和力量，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组织保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迫切呼唤足以闪耀文明星空的文艺高峰和文艺大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确保文艺出精品出人才、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承担着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等基本职能，在推出文艺精品和培养造就文艺人才方面作用至关重要。当文艺工作者面临思想困惑、创作瓶颈、工作困难、生活挫折时，文联组织应春风化雨、恰似暖阳，引导、鼓励、支持他们克服艰难险阻，勇攀艺术高峰。新时代以来，全国文联系统坚持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深度贯通“做人的工作”和“推动文艺创作”，把加强文艺工作者思想政治引领和尊重艺术家创作个性统一起来，引导其以精品力作和身体力行担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职责。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要求文联组织继续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持续强化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团结引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繁荣创作、服务人民，用心用力用情描绘更加幸福美好的文明图景。

高质量书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艺篇章

坚定文化自信，在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校准文艺实践的坐标。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根本在于中华文明具有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文化主体性，集中表现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也为做好新时代文艺文联工作提供了清晰坐标。就文艺而言，突出的连续性要求不能割断历史、虚无历史、歪曲历史，把握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突出的创新性要求勇于创新创造，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突出的统一性要求建设多元一体文化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突出的包容性要求加强交流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突出的和平性要求用文艺架起沟通心灵的桥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文联将聚焦主责主业，巩固壮大“两个优势”，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继续组织开展大规模、广覆盖、思想性、专业性文艺界培训，团结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对照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定位文艺实践的坐标方向，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中，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内核和精神根基。

秉承开放包容，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塑造中华文化新形象。开放包容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力来源。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胸怀天下的气度和开放包容的秉性，在与各民族交流交往过程中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底色因坚守而愈发厚重，文明的光泽因交流而愈发耀眼。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文明。文艺是凝结心灵、沟通世界的有效方式，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辨

识度。我们既要用文艺的多姿表现中华文明精神文化标识，让各国人民从世界艺术舞台中感受中华文明气象，又要用文艺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通过审美的视角看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文联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宣传战略任务，精准开展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拓宽国际视野，开放文明胸襟，包容文化差异，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让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故事用审美的方式广泛传播，让世界人民在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心灵桥梁。

坚持守正创新，在践行“两个结合”中开拓广阔的文艺空间。“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基础上得出的真理性认识，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推动创作蕴含中华文明独特气韵的文艺精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本质上是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也是守正创新的过程。就文艺而言，守正，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高扬人民性的党领导下的文艺发展道路；创新，就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文联将大力实施《中国文联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五年工作规划（2022—2026）》，持续进行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推动“两个结合”根本要求入脑入心，科学制定实施年度重点创作目录制度，健全文艺创作组织协作机制，扎实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持续深化文艺评奖评论，引导文艺工作者正确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手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宝贵价值，推动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图谱，奏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人乐章。